

The Politics of
Libertarian
Paternalism

Why Nudge?

为什么助推



[美] 卡斯·桑斯坦 (Cass Sunstein) 著
马冬梅 译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Nudge?

为什么助推



THE ART OF CHANGING BEHAVIOR



CHANGING BEHAVIOR

The Politics of
Libertarian
Paternalism

Why Nudge?

为什么助推

[美] 卡斯·桑斯坦 (Cass Sunstein) ◎著

马冬梅◎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为什么助推 / (美) 桑斯坦著 ; 马冬梅译 .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 2015.5

书名原文 : Why Nudge?

ISBN 978-7-5086-5101-9

I. 为… II. ①桑… ②马… III. 经济学—通俗读物 IV. F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67073 号

Why Nudge?

Copyright © 2015, Cass R. Sunstei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为什么助推

著 者 : [美] 卡斯 · 桑斯坦

译 者 : 马冬梅

策划推广 :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0 字 数 : 90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 01-2014-1919

广告经营许可证 :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 ISBN 978-7-5086-5101-9 / F · 3354

定 价 : 35.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 author@citicpub.com

Why Nudge?

引言

“天天烧烤”与家长式管理

在华盛顿的威斯康星大道上，你会看到一家名为“天天烧烤”的餐厅，这家餐厅在午市和晚市会提供一系列“≤600 卡”热量的特色菜品，每道菜品所含的热量都不超过 600 卡路里。你可以点酒炖鸡肉配意大利面，或者蟹黄三文鱼配芝麻菜，外加一份焗番茄，还可以点爱达荷州烤鲑鱼，这也是我的最爱。“≤600 卡”热量的系列菜品印在该餐厅大菜单上非常显眼的位置，餐厅外面的一块大广告牌上醒目地写着“≤600 卡”，还配有特色菜单上各色菜品的图片，令人垂涎欲滴。

“天天烧烤”这种做法算得上是家长式管理的做法吗？或许不算。这也许只是商家为了迎合顾客的需求，告诉那些注重健康的顾客本店

能够提供他们所需；抑或“天天烧烤”认为人们的喜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通过尝试改变人们的喜好，从而带来新的商机；但是，也许它认为选择低热量的健康菜品有益于顾客，希望帮助顾客做出这样的选择，因为如果没有“天天烧烤”的影响，这些顾客可能不会选择这些菜品。

倘若最后一个解释是合理的，那么可以说该餐厅并没有强迫任何人做出任何选择。如果人们愿意，即使在“天天烧烤”也可以享用到高热量菜品。但是，推出“≤600卡”菜单是为了突出这些健康菜品以便顾客可以选用，从而促使顾客在“天天烧烤”用餐，并且更倾向于选择此类菜品。如果是这样，这就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家长式管理的例子。

显然这种家长式管理相对温和，而且不是出自政府。但如果这算得上是家长式管理，那么它真的让人反感吗？如果政府在自己的餐厅也采用“≤600卡”菜单，或效仿《平价医疗法案》，要求连锁餐馆以及类似食品零售机构在菜单上标明食物所含热量以推动健康饮食，结果会不会变得不同或更糟呢？如果政府着手执行强硬的甚至带有教化色彩的政策来推进健康饮食，或者效仿法国、荷兰、英国、匈牙利、爱尔兰以及罗马尼亚（其中，有些国家已经开始针对不健康食品征税，有些国家正在考虑中）针对不健康食品征税，又会有什么影响呢？

家长式管理向来会激起民众的强烈情感。很多人都厌恶家长式管

理的做法，他们认为即便最终会坠入深渊，人类仍然有权选择自己的道路；即使他们愚蠢地冒险，别人也无权干涉，因为他们有权愚蠢。人们尤其反感政府的家长式管理行为。关于健康财富也好，关于性或宗教也罢，政府官员都无权干涉任何一个成年人所做的决定。

尽管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论自由》中的观点在19世纪极富争议，但到了21世纪，他却拥有了大批追随者。他在这部振奋人心的不朽之作中强调，如果政府的目标是保护人民不受损害，那么政府就无权干涉人民。其中重要的一篇写道：

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何一个成员，我们之所以能够使用一种权力反对其意志又不失为正当，唯一的目的是防止其对他人的危害。如果说为了那人自己的好处，那么不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不能成为充足的理由。不能因为一件事情有利于一个人、会让一个人更幸福或者其意图在别人看来是聪明的甚至是正当的而强迫他去做或者不做某件事情，这是不对的……任何人的行为只要涉及他人，就要对社会负责。而对于仅仅涉及他本人的那部分，他的权利则具有绝对的独立性。个人对他本人、他的身体和心灵是最高主权者。

这便是穆勒的伤害原则（也称为自由原则），一个人的行为只要没有伤害到他人，政府就无权干涉。“消费者至上”作为现代经济学和许

多政治辩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与伤害原则有很多相似之处。尽管穆勒所关注的焦点似乎是围绕道德立法，但我们很快就意识到伤害原则引发了对很多法律和规定的质疑，例如要求人们凭处方购买特定药品，即便工人自愿冒险仍禁止他们在不安全的场所工作，以及促进食品安全的相关规定等。所有这些案例中，在很大程度上政府是出于促进人们自身利益的目的而对其行使权力。此类法规一旦确立，人们将不再是自己身体和思想的主人。

本书的目的旨在对伤害原则提出质疑，因为在某些情形下，人们往往会犯错，而家长式管理的干预可能有利于人们的生活。在这些情形下，我们可以从道德层面为家长式管理提供有力的辩护。我还指出我们的行为受到的一些重要影响虽然与伤害原则严重冲突，却无法避免，从这个意义上讲，伤害原则是无效的。我们将会看到伤害原则会排斥现有的一些合理行为，并且会禁止很多潜在的有益的革新措施。当然，限制政府的权力是极其重要的，而且个人也往往最了解其自身情况，不应该把成年人视为孩子。在这一点上，穆勒让我们受益匪浅。但是在他之后，我们了解了很多他不了解也无法了解的事情，尤其在人类错误方面更是如此。而且，我们所了解的东西冲击到了伤害原则的一些立论基础。

在美国、欧洲及其他地方，有很多人支持伤害原则。在他们看来，国家保姆至多是个烦人的干预者或专制独裁者。在近代，民主国家都

曾在理论上或实践上讨论过家长式管理的合法界限。目前，人们对旨在减少吸烟和增加锻炼的措施，以及声称近年来为降低肥胖和不健康饮食所导致的风险而努力的“食品警察”争论不休。“≤600卡”菜单目前还没有引发太多争议，但是如果政府试图提出要求或者推广此类菜单，无疑会激起公众的抗议。

在美国，公众总是针对一些诸如要求人们系好安全带或者骑摩托车戴上头盔这类明显合理（及挽救生命）的法律进行争论。很多人认为《平价医疗法案》中要求所有成人购买健康保险的“个人强制医保”是一种让人反感的家长式管理做法。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争论的具体内容会有所变化，但是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却一直不变，而且在这一方面不存在明确的党派界限。家长式管理有时会受到试图改善民众饮食的民主派的青睐，有时又会受到鼓励贞洁和忠于婚姻的保守派的推崇。

在穆勒的论述中，只有“当对其他人有明确的伤害，或者有明确伤害的危险时，才超出了自由的范围，应该接受道德或法律上的惩罚”。穆勒提出很多独立的理由来证明伤害原则的合理性，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个人最了解什么对自己最有益。在穆勒看来，外人包括政府官员在内，都缺乏必要的信息。他认为，“对于一个人的福利，他本人是对此关切最深的人；除非私人联系很强，否则任何人对于他的福利所怀有的关切，和他对自己所怀有的关切比较起来，都是微薄而肤

浅的”。穆勒还主张“对于自己的情感和境况，即使最普通的男女也自有其认知方法，并且远远超过其他人”。当社会试图干涉个人判断时，这种干涉只能是以“可能完全错误的一般臆断为根据，这种一般臆断即使有合理之处，也很有可能被一些如局外人般不甚了解某些个案的人误用于个别案例”。

穆勒认为，如果是为了确保人们生活幸福，那么对官员来说合理的解决方式是让民众自己选择他们的道路，因为他们比官员更了解自己的喜好和处境，他们更清楚自己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途径。

接下来是一场为自由市场及各个领域的自由选择进行的持久辩护，包括那些人们自愿去冒险而结果却并不如意的领域。这场辩护本质上很有意义，我们姑且称之为伤害原则的“认知辩护”。“认知辩护”极具说服力，在我看来它是对伤害原则目前最强有力的支撑。当然伤害原则也有其他一些论据来支持，如人类的多样性、实验和长期学习的重要性，以及尊严的价值和选择自由的价值。我们将逐一详细探讨。

选对，选错？

“认知辩护”有很强的直觉吸引力，但是这种观点是否正确？从很大程度上来讲这是一个实证问题，内省、修辞、逸事趣闻或直觉判断都无法充分地回答这个问题。近几十年来，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在社

科领域进行的某些极其重要的研究一直在尝试回答这个问题，这类研究不仅对社会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极大地影响着全球的政府官员。

人类大脑确实是一台奇妙的仪器，与那些想替他人选择的人相比，人们自己往往能做出更好的选择，但是行为主义研究却使“认知辩护”面临严重的问题，因为行为主义研究表明人们会犯很多错误，有些错误甚至是极其严重的。我们来看联邦法官理查德·波斯纳颇具教育意义的一段话，他是行为经济学的资深评论家，也是“人类本质上是理性的”这一观点的忠实拥护者。他说：

所谓“行为经济学”……已经危害了人作为理性的自身利益最大化者的经济模式，并暴露出了消费心理学的肆意剥削。商家深知这一点：消费者很容易被营销人员操控，从而在借贷、投资、购买食品、保健及教育等商品和服务方面做出一些错误的选择；但如果他们掌握了更全面的信息，他们就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对此，一些经济学家也逐渐有所认识。

人类有时会目光短浅并容易冲动，过分地关注眼前行为，如吸烟、开车发短信或过多地食用巧克力。因此，显著特征非常重要。如果某一情境、活动或者产品缺乏显著特征，人们可能会忽略它，这可能对他们有利（或许因为该活动或产品在另一个房间，而且会使人发胖），也可能对他们不利（因为该活动或产品有可能帮他们省钱或者延长寿

命)。人类总是拖延，有时也会因此蒙受损失。人们深受失则处理规则的影响，失则处理规则在人们不作为时会替人们做出选择。由于很多人会选择不作为，所以默认设置有可能会给人们带来很多好处，也可能给人们造成巨大的损失。人们可能会不切实际地乐观，也会因此做出错误甚至危险的选择。他们会犯“情感预测错误”，例如他们会预测某些活动或产品会对他们的福利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影 响，但这些预测后来被证明都是错误的。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自由市场能有效地保护人们不犯此类错误，竞争能阻止商家尝试利用我们的偏好诱导我们犯错。如果商家提供了无益的失则处理规则，引导消费者做出给自己带来危害的选择，商家就会受到市场竞争的惩罚。谁还会信任这样的公司或与这样的公司有生意往来呢？那些隐藏重要特征并因此而致使消费者花费大量钱财的公司最终会失去客户。大多数时候，自由市场是防止这种认知错误的最有效的保障措施。

此外，商家会提供大量的服务帮助客户克服自我控制方面的问题。自由市场也会有力地激励商家采取措施以回应这类问题或其他问题，这些回应措施会因新技术而更实用、更新、更快、更新颖，并更具个性化特色。如果你有体重方面的问题，相应的仪器可以给你提供帮助，这些仪器能够监控你的食物摄取量，并就如何实现目标给你提供明确的建议。实用软件的应用也越来越普遍，而且未来我们还会看到更多。

“帮助人们预防自己的错误”这一市场发展迅猛，将有大量的行为应用程序被设计出来，专门用于帮助人们防止自己易犯的错误。

但是同时，自由市场很可能会奖励那些试图利用人类错误的营销人员。在可识别的情况下，那些没有利用人类错误的营销人员会因他们的竞争对手利用了人类的错误来获利，而受到市场力量的严惩。信贷市场也有很多这方面的惨痛案例，如手机计划、信用卡计划以及支票账户和抵押贷款都是非常好的信贷形式，但这些形式往往极其复杂，并且可能会隐藏一些如透支保障费过高等潜在的不利因素。在所有这些行业中，提供清晰又简单的产品的商家很可能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因为它们没有充分利用人们犯错的倾向。

当然，在不同情境下人类错误的性质和程度还有待我们去了解。我们都知道人类的行为体现了“生态理性”，也就是说在拇指法则或启发式方法适用的环境中，我们往往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此类环境都是常规情形而非例外，因此，我们所做的选择通常都是适合我们自己的选择。与其指控人们“缺乏理性”，不如说他们只是展示出了有限的理性，这似乎更有道理。而且在很多时候，有限的理性反而更好，其结果与试图通过全面权衡得失而达到最优化所产生的结果一样，甚至更佳。

至于错误，我们每天都能学到很多新的东西。人类对一些行为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需要进一步证实，我们未知的东西还有很多。随机对照试验和实证研究黄金标准都应该被更广泛地运用，以便让我们更

好地了解全球相关研究是如何开展的。然而，即便在这个起步阶段，基础研究依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行为经济学、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等相关领域对一些国家的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如美国和英国。

在美国，很多新的举措都深受行为研究的影响，包括信息披露、警告和失则处理规则等这类被广泛运用于燃料节约、能源效率、环境保护、医疗保健以及肥胖症等领域的措施，事实上行为研究结果也逐渐为美国法规和其他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

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也成立了一个“行为研究小组”，目的在于把对人类行为的了解运用到政策革新中。其官网声称它从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领域日益丰硕的学术研究中获得启发，行为经济学和心理研究表明决策方式的细微变化会极大地影响人们对该决策做出的反应。该行为研究小组已经运用这项研究推动了很多领域的改革创新，其中包括戒烟、能源效率、器官捐赠、消费保护、慈善捐赠以及一般意义上的遵从策略等。其他国家也对该小组的工作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其业务范围也在不断扩大。2013年奥巴马政府也成立了相关小组来研究行为科学，为其政府决策提供实证支持。

行为经济学受到了整个欧洲的关注，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制定了一个消费者政策工具包，该工具包中建议的很多新举措就是基于行为研究的。欧盟健康与消费者保护部门也受到了行为经济学的影响。欧盟委员会的报道《绿色行为》旨在借助行为经济学进行政策革新以

保护环境。对数量日益庞大并且深受行为主义影响的各种新方案进行编目分类的尝试，引起了人们对“心理状态的崛起”的关注。这一术语可能达不到最好的宣传效果，因为它似乎令人担忧，没有人会为一个声称支持“心理状态”的候选人投票。但是，这个术语的优势在于它能凸显全世界为制定合理的、低成本的，同时又兼顾人类思维和行为的政策而做出的努力。

选择架构

对于人类错误的研究自然会引起一个问题，即对人类思维和行为更深的认识是否会给予家长式管理更大的空间。这种更深的认识或许会为政府行为提供合理的解释，由此补充“市场失灵”的传统经济原因，既不会伤害到他人，也不会引发集体行动问题。我们都知道，人们会受到选择架构的极大影响。选择架构是指人们做出选择时所处的背景。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它的存在，它都无处不在，也无法避免，而且会极大地影响结果。事实上，选择架构有时候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它会引导我们走向某一个方向，有效地帮助我们做出大量的决策，而且也会影响很多人。例如，打印机不是有单面或双面的默认设置吗？如果选择了单面设置，你将需要更多的纸张。如同其他地方一样，这里也无法避免选择架构。

著名小说家戴维·福斯特·华莱士在一次演讲开场时讲了这样一个笑话：“有两条小鱼在一起游泳，一天它们碰巧遇到了一条老鱼。老鱼向它们点头，并说：‘早上好，孩子们，水怎么样？’这两条小鱼继续往前游，其中一条小鱼实在忍不住了，问另一条小鱼：‘水是什么东西？’”毫无疑问，这是一则跟选择架构有关的笑话，还好这类笑话不是很多。这则笑话寓意深刻，因为它关注了生活中一个重要的事实，这一事实对我们至关重要，甚至是社会背景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却因习以为常而忽略它、无视它。我们将看到，这会为伤害原则带来严重的问题，因为影响我们选择的因素无处不在，但我们却看不到。

当我们去自助餐厅、餐馆、医院或杂货店的时候，当我们选择抵押贷款、汽车、医疗保健计划或信用卡的时候，当我们打开平板电脑或计算机浏览我们喜欢的网站（包括政府网站，这些网站往往会突出某些主题而淡化其他主题）时，当我们申请驾驶证、许可证或者社会保障福利的时候，这种选择架构都无处不在。“天天烧烤”当然也提供了一种选择架构，它的“≤600 卡”菜单便是该选择架构的一种形式。所有餐厅都有选择架构，任何菜单都包含某种形式的选择架构。菜单对于菜品就如同候选人对于职位一样重要，除了其他因素之外，人们在选择时总是会受到先入为主的影响。1997 年，美国的大学入学考试主管人员将学生自由填报志愿的数量由 3 个调整为 4 个，这样学生就

可以申请更多的学校，那些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也可以进入更好的大学，因此能够获得更高的预期收益。

对于所有人，一个关键的问题是：选择架构对我们有益、简单易懂，还是对我们有害、复杂难解甚至具有剥削性？任何架构都会对受其制约的人们产生影响。既然我们无法消除选择架构，那么对伤害原则的违背是否也无法避免呢？穆勒以及他的追随者难道没有意识到选择架构无处不在吗？

这个问题引发了很多其他问题。包括公共领域在内的选择架构设计师有权按照自己的偏好影响他人的决定吗？这种做法是否属于让人反感的家长式管理呢？谁来监管他们，或者说谁来为他们设计选择架构呢？经济学家对市场失灵的详细阐述，包括对垄断、消费者信息缺乏及对自愿协议中的第三方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如污染（外部性）的分析，证明了政府干预的合理性，但这种阐述似乎是不完整的。各种实证研究结果让我们看到了一系列行为化的市场失灵，行为化的市场失灵指能够补充传统经济描述且源于人类犯错倾向的市场失灵。那么，用这类失灵为法律法规辩护是不是使你无法接受家长式管理的行为？用选择架构来防止行为化的市场失灵合法吗？

对此，我的基本回答是选择架构无法避免，而且行为化的市场失灵的确能够证明某些家长式管理形式的合理性。当市场失灵真正发生且影响较大时，即使没有对他人造成伤害，也有充分的理由对政策进